

辽代进士仕宦问题考述^{*}

蒋金玲

本文考察了辽代进士的初授官职、官职迁转、最终官职分布及进士入仕的功效和意义等问题，认为随着大批进士官员进入契丹统治阶层甚至入主宰执，汉官乃至整个汉人群体在辽代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以进士为主的汉族官员在治理北疆、传播儒家文化、加速北方游牧民族儒化进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辽代 进士 仕宦 汉人 儒家文化

作者蒋金玲，1978年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辽朝立国二百余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①辽朝统治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大兴科举广纳汉贤入仕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目前，在辽朝科举研究上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②但是有关辽代进士的仕宦问题学界关注较少，目前仅有杨树藩先生对辽进士的初授官职稍有论及。^③笔者试图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就辽代进士的初授官职、官职迁转、最终官职分布及进士入仕的的功效和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 本文是2011年吉林大学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汉族士人与辽代社会”（项目编号：2011QY058）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杨树森、王承礼《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5页。

② 笔者统计，有关辽朝科举制度的研究论文有20余篇，具代表性的有李家祺《辽朝科举考》，《现代学苑》第5卷第8期，1968年8月；〔日〕松田光次《辽朝科举制度考》，《龙谷史坛》第77号，1979年11月；朱子方、黄凤岐《辽朝科举制度述略》，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杨若薇《辽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都兴智《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科举制度探析》，鲍海春、王禹浪主编《东北历史地理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张希清《辽宋科举制度比较研究》，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另有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中国知网博士论文数据库。

③ 参见杨树藩《辽金贡举制度》，《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版。

一、辽代进士的初授官职

终辽之世，有记录可查的辽朝科举考试取进士至少为 2448 人。^① 辽朝科举考试主要是为汉人而设，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进士中，绝大多数为汉士，据笔者统计，辽朝进士目前能确知姓名者 205 名，其中汉人 200 名，非汉族进士 5 名。^② 辽代各阶层的汉族儒士踊跃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进士中第后绝大部分出仕为官，成为辽国的职业官僚，只有极少数人不出仕或放弃仕途。如《辽史拾遗》载“蓟镇三屯城东北二十五里为芹菜山，辽进士冯唐卿于山前结庐，种芹自给，故名。”^③ 可见进士冯唐卿并未出仕，而是在山间结庐自给。又如郎思孝，进士及第，先在“郡县”为官，后因厌倦俗世而出家为僧。^④ 也有未及出仕而病亡者，如吴昊，及第后“仕未达而歿”。^⑤

辽代进士及第者的初授官职比较繁杂，名目不一。有初授官职为“卢龙巡捕官”者，如室昉；有初授官职为州文学参军者，如常遵化；有初授官职为军事判官者，如王安裔；有为县令者，如马人望；有为右补阙、太子中舍者，如冯立、赵徽。而更多的是被授予校书郎、著作佐郎之职。^⑥

从目前史料来看，辽代进士有初授官职记载者 122 人，其中初授官职为各类校书郎的有 85 人，如王泽，“开泰七年登进士第，释褐，授秘书省校书郎”；奚景庸，“清宁中第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⑦ 而太平五年（1025）十一月，辽圣宗曾一次授予进士张昱等 14 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 58 人为“崇文馆校书郎”。^⑧ 另外，辽代进士初授官职为著作佐郎的有 7 人，如史洵直，“清宁八年，登进士第。释褐授著佐”；贾师训，咸雍二年（1066）进士，“三十有五，登第。授秘书省著作佐郎”。^⑨ 可见辽朝进士初授官职为校书郎、著作佐郎的比例是比较大的。

辽代校书郎、著作佐郎之官阶、职掌，可参比唐制。唐朝秘书省设校书郎 8 人，正九品上，“掌雕校典籍”。^⑩ 又据《旧唐书》卷 43《职官志二》记载：秘书省又下辖著作局，设著作郎 2 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 4 人，从六品上，“著作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

① 参见李桂芝《辽朝进士杂考》，《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2 期。

② 笔者是在朱子方《辽朝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 年第 4 期）基础上，主要根据《辽史》、《金史》、《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畿辅通志》、《元好问全集》、《契丹国志》等统计。

③ （清）厉鹗《辽史拾遗》卷 14《地理志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292 页。

④ （金）王寂著、张博泉注释《辽东行部志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 页。

⑤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 29《显武将军吴君阡表》，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07 页。

⑥ 《辽史》卷 79《室昉传》；《常遵化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8 页；《王安裔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687 页；《辽史》卷 105《马人望传》；《辽史》卷 8《兴宗纪一》。

⑦ 《王泽墓志》、《史洵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260、651 页。

⑧ 《辽史》卷 17《圣宗纪八》。

⑨ 分见《史洵直墓志》、《贾师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651、480 页。

⑩ 杜佑《通典》卷 26《职官八》，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735—736 页。

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也”。唐另有崇文馆校书郎，崇文馆属太子学馆，设校书 2 人，从九品下，“掌校理四库书籍”。^①可见校书郎、著作郎等监馆文职是有收藏、校勘图书以及撰文等相应职责在身的，虽然这不见于《辽史》记载，但可以从辽代墓志中得到印证。据《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记载，李继成文笔较好，即墓志所称“霞烂锦舒，槁华词藻。京师振誉，朝阙称奇”，故“统和五载，霈渥槐宸，策名芸阁，始十六岁起家特授将仕郎、守崇文馆校书郎”。“芸阁”指藏书库，李继成既为“崇文馆校书郎”，又在藏书库任职，可见崇文馆即为辽廷藏书库。墓志又云，李继成 19 岁时“守秘书省著作佐郎，职在修文”，^②则明确指出“秘书省著作佐郎”有“修文”之职责。

按唐制，无论秘书省校书郎还是崇文馆校书郎均为九品官员，而辽代著作郎与著作佐郎作为及第士人的初授官职，其品阶应与校书郎不相上下。据《张绩墓志》记载，张绩于太平十一年（1031）登第后，“解褐，授将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③张绩的散阶为从九品下的将仕郎，他所对应的官职秘书省著作佐郎当也在九品左右。尽管辽代进士的初授官职不高，但他们的政治前景较好，官职迁转较快，这一点可从他们的仕历得到证明。

二、辽代进士的官职迁转

辽代取得科举出身的士子，初授官职多为校书郎、著作佐郎之类的低级文官，他们下一阶段的迁转官职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为各军州军事判官，如张绩初授官职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两年后“改授涿州军事判官、试大理评事”。^④郑恪，清宁八年（1062）进士，“选授秘书省校书郎。明年，授松山州军事判官，加文林郎”。^⑤孟初，大康九年（1083）“登进士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大安二年，授涿州军事判官”。^⑥

另一种是在朝担任南枢密院令史。辽代官分南北，南面官之设虽“用唐制”，^⑦但又与唐制有所区别。唐代尚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六部分理天下之事。而辽代南面最高行政机构为南枢密院，下设吏、户、兵、刑、厅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⑧辽代进士出任枢密院各房的职官，是从辽圣宗时期开始的。据《王泽墓志》记载，王泽开泰七年（1018）中进士第，初授官职为秘书省校书郎，经历营州军事判官之职后“宣充枢密院令史，太平五年，迁吏房令史，权主事。进士隶院职，自父始也”。^⑨自此以后，进士开始进入南枢密院各房任职，这是进士政治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杜恂，咸雍十

① 《旧唐书》卷 44 《职官志三》。

② 《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③ 《张绩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314 页。

④ 《张绩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314 页。

⑤ 《郑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428 页。

⑥ 《孟初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97 页。

⑦ 《辽史》卷 47 《百官志三》。

⑧ 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 页。

⑨ 《王泽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260 页。

年(1074)进士及第,大康四年(1078)授檀州军事判官,大康七年(1081)“充枢密院令史”,与王泽经历类似,杜忞于大安六年(1090)也从枢密院令史“迁户房主事,加尚书左司郎中”。^①还有科举及第便进为枢密院令史者,如尚曄,清宁五年(1059)进士及第,“当年勾充枢密院令史”。^②

另据《王师儒墓志》记载,王师儒于咸雍二年(1066)进士及第后“特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执政者惜公徒劳于州县,擢充枢密院令史”。^③这条史料除了说明王师儒也是从秘书省校书郎迁转为南枢密院令史外,还可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出任州县外职与在朝为枢密院院职是辽代进士及第者官职迁转的两大选择;其二,“惜”、“徒劳”等辞说明辽代有重朝官轻外任的风气,对取得科举出身的士人来说,在朝为官往往比出任外职更具吸引力。

这些进士官员经历军州判官或枢密院令史等职的历练后,大多进入更高级别的职能部门。辽代官制有品、阶、勋、爵、封等,这可从《冯从顺墓志》得到证明。^④阶又称“散阶”。唐制,文散阶自将仕郎(从九品下)至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共29阶。辽的文散阶也是沿袭唐朝旧制,唯“光禄大夫”(从二品)、“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和“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因避太宗德光名讳,分别改称崇禄大夫、金紫崇禄大夫和银青崇禄大夫。^⑤唐以散阶定官员等级,“辽亦然”,辽代官员升迁,“主要表现是进阶”。^⑥故我们可以从官员的散阶变化来进一步考察辽代进士官员的官职升迁。

史料中关于辽代进士的进阶情况以《张绩墓志》记载较为详尽。由墓志得知,张绩从景福元年(1031)解褐授官,自从九品下的将仕郎历文林郎、登仕郎、儒林郎、承务郎、承奉郎、徵事郎、给事郎、宣义郎、朝散郎、宣德郎、朝请郎、通直郎、奉义郎,一步步进阶,直至重熙十九年(1050),张绩散阶为从六品上的奉义郎。这以后的记载缺损严重内容难辨,及至清宁四年(1058)卒于在任。^⑦张绩历19年才进14阶,升迁甚是缓慢。

并非所有进士及第者都严格遵循一步一阶方式升迁,越阶迁转的俯拾即是。如穆宗时期进士常遵化,从保宁元年(969)授将仕郎(从九品下),至统和九年(991)便至银青崇禄大夫(从三品),22年便进了25阶,^⑧显然中间经历了越阶升迁。史询直清宁八年(1062)登进士第,“释褐授著作佐,寻差充西京管内都商税判官。迨后复历一十八任,官至左谏议大夫,致仕”。^⑨史询直最终官职为左谏议大夫,按唐制为正四品下,^⑩对应的散阶则为通议

① 《杜忞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04—305页。

② 《尚曄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98页。

③ 《王师儒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46页。

④ 参见《冯从顺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70页。

⑤ 参见唐统天《辽代汉官的散阶制》,《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3期。

⑥ 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187页。

⑦ 参见《张绩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13—314页。《张绩墓志》因为缺损,并未载“给事郎”与“通直郎”,但这两阶可以根据上下文推断出来。另所引墓志还有一处错误,即所谓张绩重熙十七年冬授“银青崇禄大夫”,因为从下文可以看出,于重熙十九年,张绩的散阶才至奉义郎。

⑧ 参见《常遵化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128页。

⑨ 《史询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51页。

⑩ 参见《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

大夫。史洵直由将仕郎至通议大夫为 23 阶，只历 18 任，也表明他的升迁也不是一步一阶地进行。常遵化、史洵直两人虽历越阶迁转，但其迁转速度与朝廷重臣比较而言仍显缓慢。

辽代各个时期的进士重臣，他们也基本经历了越阶快迁，并且，从其为官履历来看，仕途通畅与否跟个人才能息息相关。辽代进士出身官员中，最终散阶明确的有 12 位，其中阶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正二品）、金紫崇禄大夫（正三品）、银青崇禄大夫（从三品）各 2 位，朝散大夫（从五品下）的 3 位，以及奉义郎（从六品上）1 位。这些一、二品重臣宰执的仕宦经历充分说明了个人才能在其官职迁升中的关键作用。

阶至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为张俭和梁援，分别为圣宗、道宗时期的重臣。张俭乃统和十四年（996）状元，开泰四年（1015）便“论思秘殿，参预中堂。朝廷能之，遂掌军国”，至开泰五年（1016），入仕仅 20 年，阶已迁至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太平六年（1026），官至南院枢密使兼政事令。张俭仕途显达主要是因为其政治才能优异，“在相位二十余年，裨益为多”，即使致仕后，遇大事兴宗亦多向他咨询。^①梁援为清宁五年（1059）进士，最初任命为儒林郎（正九品上），乃通才能臣，曾“三奉命接送南朝国信副使，六充馆伴副使，一充皇太后南朝正旦国信副使，提按刑狱者六次，诠读考试典章贡举者十次，其他出使小国杂领繁务者，率在其间”。寿昌六年（1100）加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历官 41 年，升至从一品官。^②

阶至特进（正二品）的有王师儒和杜恂，俱为道宗时期重臣。王师儒乃咸雍二年（1066）进士，特授将仕郎（从九品下）。咸雍六年（1070）冬迁儒林郎，大康三年（1077）秋，加朝散大夫（从五品下）。儒林郎至朝散大夫为 14 阶，王师儒仅历 7 年。大安五年（1089），又加大中大夫（从四品上）。大安八年（1092）冬，“阶升”崇禄大夫（从二品）。王师儒历官 26 年，便升至从二品官，最终散阶为特进，王师儒升迁迅速，也是因为其个人才能突出故得到道宗器重，正如其墓志所言，“向未十数年，清资要职，连至九迁，是上意方图柄用”。^③又如杜恂，辽道宗咸雍十年（1074）中进士第，大康四年（1078）授檀州军事判官，大安七年（1091）加少府少监（从四品下），仅历 13 年便迁至从四品官，至寿昌五年（1099）冬官阶为少府监（从三品），乾统十年（1110），升枢密副使，天庆元年（1111）授参知政事、签枢密院事，次年加特进，升至从二品官历时 33 年，虽经历过两次降职，总的来看其仕途仍属畅通。墓志称杜恂“谨恪时笃，勤劳精会”，在枢密院、中书省任职 17 年，“五房纲纪，两府规模，辄有稽疑，悉能别白”，^④可见个人才能突出是杜恂仕途通达的主要原因。

阶至崇禄大夫（从二品）的为梁颖，据《梁颖墓志》记载，梁颖为重熙二十四年（1055）进士，经历试职外任后，清宁六年（1060）入掾为枢密院书令史，“自初隶枢庭，经十四年十三迁而为副都承旨”，又“四迁”为枢密副使，最终阶至崇禄大夫。其仕途通顺的主要原因便在于他材优干济，正如宰相杨皙与姚景行所赞“为勤干得称誉者，公首誉

① 参见《辽史》卷 80《张俭》；《张俭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265—270 页。

② 参见《梁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520 页。

③ 《王师儒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646 页。

④ 《杜恂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第 305 页。

焉”。^①

另外，其他一些散阶不明而仕历清晰的进士宰执的迁转过程，也充分证明了个人才能对仕途影响至关重要。如刘伸，重熙五年（1036）登第，咸雍二年（1066）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自登第至宰执历30余年，在治理刑政、理财方面颇有政绩。^②姚景行，重熙五年（1036）进士登第，乃道宗治国顾问，清宁元年（1055）为参知政事，^③自登第至宰执不过19年，咸雍二年（1066）又拜南院枢密使，在平叛、治理滞狱方面均有出色表现。^④耶律俨，为道宗咸雍中（1065—1074）进士，至寿昌初（寿昌元年为1095）已任职枢密院、参知政事，自登第至宰执，历时不足30年，主要是以史才闻于后世，曾著《皇朝实录》70卷，为元修《辽史》的重要依据。^⑤

三、辽代进士的最终官职

“唐代以散官定官员班位，而以职事官定其职守……散官按资历升迁，而职事官则由君主量才使用”。^⑥辽代的情况应也不出其右。辽代大部分官员的仕历中，对其职事官的记载比较详备，但对散阶的记载则相对简略，有些官员的仕历甚至对散阶只字不提。鉴于此，要论述进士的仕宦情况，除了通过进阶情况分析其官职迁转外，还需要考察其最终官职的分布情况。

据史载，辽代进士最终官职明确者有54人，官职名目繁多，按官品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大类，^⑦其中终于高官者共有39人，终于中等官职的6人，终于低级官职者9人。^⑧现分述如下：

其一，终于高官的39人，所任官职有宰执、^⑨五京留守、节度使、诸行宫都部署、翰林学士等，又以宰执、节度使为多。

1. 官至辽廷宰执的有26位，其中，官至南面最高官南院枢密使的有室昉、张俭、杨又玄、杨皙、姚景行、马人望等6人；官至南府宰相的有杜防、王棠、赵徽，赵廷睦等4人；官至北府宰相的有室昉、姚景行、张孝杰等3人，而杨遵勳曾先后担任南府宰相、北府宰

① 杨卫东《辽朝梁颖墓志铭考释》，《文史》2011年第1辑。

② 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③ 参见《辽史》卷21《道宗纪一》。

④ 参见《辽史》卷96《姚景行传》。

⑤ 参见《辽史》卷98《耶律俨传》。

⑥ 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454页。

⑦ 辽代官品基本按照唐制推定，如唐无此官，则按金制推定。高官指品阶为三品（包含三品）以上的官员。中官指品阶为四至六品（包含四品与六品）的官员，低官指品阶为七品至九品（包括七品与九品）的官员等。

⑧ 下文分析辽代进士最终官职时，凡是未作注释的，其史料来源均见《辽史》本传及《辽代石刻文编》相应墓志。

⑨ 关于辽朝的宰执机构与宰相设置，史学界存在较大歧异，笔者采纳李锡厚先生的观点，即辽代的宰执群体分为北、南两大系统，北面宰执为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及南府宰相；南面宰执为南院枢密使、大丞相、中书令（政事令）及参知政事（重熙十二年之后）。参见李锡厚《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相。辽代宰执设置与唐制、金制异，故无法参照唐、金制确定品阶，但可以肯定，应为三品以上高官。

2. 官至五京留守者 2 人，即刘霄、^① 大公鼎都曾任中京留守。按《金史》卷 57《百官志三》载，各京留守为正三品。辽代五京留守的品阶应大致与金制同。

3. 官至节度使、刺史 7 位。张思忠、王泽、董庠、邓中举、程冀、程四穆等 6 人为节度使，常遵化刺史。《金史》卷 57《百官志三》载各州节度使为从三品。辽代节度使品秩当与金制同，大致也在从三品左右。

4. 诸行宫都部署 1 人，即王师儒。据《辽史·百官志一》“北面官官”条载，“诸行宫都部署院”乃辽廷在“北面官官”中设置的行宫最高机构，长官为诸行宫都部署。^②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有言“十宫院使在上将军之下、节度使之上”。^③ 某宫官使的地位既在节度使之上，斡鲁朵内最高长官诸行宫都部署的地位则更应该高于节度使，从王师儒，其官品应在三品以上。

5. 翰林学士 3 位：郑弘节、王鼎、孟初。翰林学士，按《金史》卷 57《百官志三》载为正三品。辽代的翰林学士官品也大致在正三品左右。

其二，最终官职属中等的有 6 人：如节度副使 2 人：张绩、宁鉴，按《金史》卷 57《百官志三》，节度副使为从五品，辽代节度副使官品大致也在从五品左右。上京盐铁副使 1 人，即郑恪，据《郑恪墓志》记载，郑恪“四迁至少府少监，知上京盐铁副使”，^④ 少府少监为从四品，则上京盐铁副使品阶也应为从四品左右。理正 1 人，孟有孚，按唐制为从五品下。^⑤ 左谏议大夫 1 人，史洵直，按唐制为正四品下。^⑥ 史馆修撰 1 人，即刘辉。史馆修撰乃史馆修史的主力，辽朝仿唐制多以朝官兼任，官品并不统一，但应多为中等官员。^⑦

其三，最终官职为低官者 9 人，如王敦裕终于平州观察判官，王安裔终于泽州神山县令，宁的终于鄱阳县主簿。按唐制，都应为七品或七品以下的低官。

综合看来，最终官职明确的 54 位进士官员中，进士至高官者占总数的 72.2%，其中官至宰执者的比例几近五成。当然，由于史料的匮乏，需要说明的是，以上 54 位最终官职明确的进士中，以正常致仕方式终止仕途的只占 7 位，除了史洵直仅官至左谏议大夫外，其余 6 位，即张俭、杨佖、杨皙、刘伸、赵徽、马人望，都是官至南院枢密使或南府宰相。而其他官未至宰执或官仅为下级、中级官僚者，绝大多数是因为病卒而迫使其仕途非正常终止，如统和二十五年（1007），常遵化“授辽西州诸军事、辽西州刺史……忽染小疾，药无征

① 参见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卷 29《显武将军吴君阡表》，第 607 页《辽史》卷 105《大公鼎传》。

② 参见《辽史》卷 45《百官志一》。

③（宋）余靖《武溪集》卷 18《契丹官仪》，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08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75 页。辽代共有十二宫，余靖出使契丹乃为辽兴宗时期，所以当时尚无道宗的太和宫和天祚帝的永昌宫，故他所记为十宫院名目。

④《郑恪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428 页。

⑤ 参见《旧唐书》卷 42《职官志一》。

⑥《新唐书》卷 47《百官志二》。

⑦ 据统计，辽朝史馆修撰大多以散官、文职虚衔官兼任，他们的品阶按唐制推测，多为四品至六品，则官属中等。

愈”，薨时 65 岁。^①王敦裕出任某军观察判官时，“忽遘沉痾，屡祷灵蓍，难掩大数”，于咸雍九年（1073）逝，年仅 39 岁。^②另外梁揅、梁抃都“早逝”，他们的最终官职分别为秘书省校书郎、长庆令。^③可见在一般情况下，辽代进士升迁至高官的比例应该是比较高的。

契丹统治者要成功统治人口数量数倍于己、文明程度远高于己的汉人，必须取得一大批菁英汉士的拥护与合作，吸收他们入仕则是达到此目标最为有效的方法。而荫补与科举作为汉人入仕的两大主要途径，共存、互补。荫补是契丹统治者照顾、拉拢汉人贵族的重要手段，它主要给汉族世宦官员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机会。科举是契丹统治者在新并入燕云十六州之后，为安抚、笼络广大普通汉士而专门开设的入仕之途，它不仅为汉人平民子弟提供了平等的入仕机会，也为中下层官僚子弟甚至部分高官子弟拓宽了入仕途径。而对荫补入仕和进士出身官员的仕历进行比较，可发现进士出身者的仕途更为通畅。

辽代承荫者多被授予三班院或阁门祗候等低级官职，官品在八、九品之间，科举出身者初授官职也多为九品左右的监、阁文职。尽管荫补入仕和科举入仕者的初授官职实际是不相上下，但其最终官职分布就出现了较大差异：承荫汉士大多数多升迁为五品至二品的中、高层官僚，而科举出身的汉族官员，大部分因为能力出众而能越阶进阶，升迁至三品以上高官的人数比例比较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明确记载以荫补入仕的汉人中，没有一例官至宰执者。^④而进士出身升至宰执者众：在上文所统计的最终官职明确的 54 位进士中，官至辽廷宰执的有 26 位之多，其中官至南面最高官南院枢密使的有室昉、张俭等 6 人，另外还有官至南府宰相、北府宰相、政事令等。

可见，与荫补入仕者相比，科举出身者的仕途更为顺畅、显达。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入仕者个人的学识、才干存在差异。由于荫补是赖其父祖之官爵、功勋自然而然地入仕为官，辽廷对享有荫补权的官员子弟也并没有所谓“素质”的限定，一些官宦家庭甚至视读书为畏途，从而出现不使子弟读书而“等荫”^⑤的情况，由此可见荫补入仕者的学识水平总体不高，他们的执政能力也必定受到影响。而科举选士以儒学文化为主要标准，它所选拔的人才都是饱学儒士，凭借卓越的学识和突出的政治才能跻身入契丹最高决策层的比比皆是。科举、荫补作为辽代汉人入仕的两大途径，科举代表进步，荫补代表落后，^⑥科举入仕者的仕途比荫补入仕者更为通达，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辽朝官僚机构的运转是良性的，这是辽朝能成功统治北中国长达二百余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辽代进士入仕的功效及意义

辽代进士入仕最直接的功效，是导致了汉官乃至整个汉人群体在辽代政治地位的提高。汉官与契丹官员共同治理、开发东北边疆，促进了儒家文化在北疆的传播。

① 《常遵化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128 页。

② 参见《王敦裕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379 页。

③ 参见《梁揅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522 页。

④ 有关辽代汉士荫补入仕的情况，可参考蒋金玲《辽代荫补制度考》，《史学集刊》2010 年第 2 期。

⑤ 参见《丁文道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 639 页。

⑥ 参见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自序第 8 页。

契丹统治者大兴科举以广纳汉人菁英，并在官职的迁转中更为重视进士出身，这对渴望进入社会中上层的汉士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被辽朝以各种暴力、强制手段“移迁”入辽汉士的敌对情绪。早在辽初，契丹统治者就通过赏官、荫补等途径把汉人纳入到统治机构中来，契汉共治局面已具雏形。到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在全国“诏开贡举”^①后，各阶层汉族儒士踊跃参加科考，其中的优秀者则进士及第成为辽廷的治世人才。关于进士出身者在辽朝整个官僚队伍中所占比例，《金史·选举志》谓“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②由于辽代科举及第者绝大部分是汉士，故这个比例也基本上可以视为汉族进士官员在辽朝整个官僚系统中所占的比例。

尽管科举出身的汉官在辽代官僚队伍中比例不高，但他们学识卓越、能力突出，活跃在辽代政坛的各个领域，政治前景令人称羨，不仅升迁至三品以上高官者众，部分才学尤显者更是升至宰执，辅佐辽帝并参与辽朝最高国策的制定与重大政务的处理。如清宁元年（1055）杨绩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与姚景行同总朝政”；^③大安二年（1086）九月辛巳，道宗召南府宰相王绩议国政。^④因此，《辽史》中所谓“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⑤并不十分准确。随着大批进士出身的汉族高官进入辽决策层，汉官群体乃至整个汉人群体在辽代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

虽说汉族进士官员为辽代社会诸领域的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总体看来，契丹与汉族官员所从事的工作各有偏重，这种分工集中彰显了契丹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智慧：鉴于契丹族长于武事而汉人长于礼文的特点，辽国的武事主要由契丹人承担，而文化与经济事务则主要倚赖汉士。这种长短的互补，对辽朝统治大有裨益。以儒业见长的汉族进士官员，在传播儒家文化方面如鱼得水，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契丹本为游牧民族，对儒家文化甚感陌生，但在汉族儒士的影响下，辽建国伊始便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⑥并以此为基础大力推行科举，儒家文化开始在北方边疆地区广泛传播和普及，而进士出身的汉族官员对儒家文化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其传播途径主要有四：

其一，典掌科举。据笔者统计，目前可知已典掌过辽代科举的官员共 20 人，全部为汉官，其中 15 位为进士，其他 5 位虽未明载是进士，但不能排除也为进士的可能性，可见汉人进士官员在辽朝科举制度的开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辽代科举考试以“五经注疏”为主要内容，汉族官员通过典掌科举，为辽政府选拔了大批精通儒学的知识分子，将他们补充到辽政府的各个岗位，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其二，担任学官教授儒学。辽朝在中央设置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担任国

① 参见《辽史》卷 12《圣宗纪三》。

② 《金史》卷 51《选举志一》。

③ 《辽史》卷 97《杨绩传》。

④ 据《辽史》卷 24《道宗纪四》载：大安元年六月，“以王绩为南府宰相”；大安二年九月辛巳，“召南府宰相议国政”，则议国政者的南府宰相即王绩。

⑤ 《辽史》卷 106《卓行传·序》。

⑥ 参见高福顺《尊孔崇儒华夷同风——辽朝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特点》，《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5 期。

子监官员的汉族进士官员肯定不少，但见于史载者仅有刘六符、刘尧^①两人，都曾任国子监祭酒，其中刘六符为进士，其职责按唐制为“掌儒学训导之政”，总管国子学、太学等七学，传授《周易》、《尚书》等儒家经典。^②还有不少进士官员在国子学、五京学、府学、州学、县学等各级学府担任学官、教授儒典，不仅传播了儒家文化，也为科举考试输送了大批人才。

其三，向契丹皇帝阐扬儒学。一些德业儒素过人的进士官员常有机会向契丹皇帝、皇子传授儒学，如统和元年（983），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室昉进“《尚书·无逸篇》以谏”，^③便是间接对辽圣宗进行“明德”、“慎罚”和“保民”儒家教育。辽道宗也屡召汉族名儒至宫廷讲儒学，如大安四年（1088）四月，耶律俨为道宗“讲《尚书·洪范》”；^④而梁援也曾给道宗讲《周易·乾卦》。^⑤契丹皇帝也重视对皇子（孙）的儒学教育，辽道宗为燕赵国王时，姚景行曾教授其儒学。^⑥而王师儒对耶律延禧的教育延续达18年之久。^⑦契丹皇帝多以儒学见长，即跟这些博学鸿儒的阐授分不开，在契丹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维护下，儒学在辽境更加兴盛开来。

其四，家学传承。汉人进士儒学涵养深厚，他们极为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如名儒室昉曾教授其外孙李继成，故而李继成儒学涵养较高。^⑧王敦裕本人乃进士“乙科”出身，他有三子，“率皆干蛊推诚，趋庭习训”。^⑨“趋庭”即子承父教之意，可见王敦裕三个儿子都是受他的儒学熏陶。这种重视家学传承的现象在辽代汉人家庭中比较常见，此即辽代多汉族“进士世家”的重要原因。据统计，辽代汉族“进士世家”有15个之多，其家族进士数量从2到8个不等，其中进士最多的为程冀家族，祖孙三代进士及第者竟然多达8个，无怪乎“士族号其家为‘程一举’”。^⑩虽然很难说这些进士世家子弟都是通过家学研习儒业，但毋庸讳言，家庭环境对个人学术取向影响至深，父祖以儒见长，子弟耳濡目染，或者直接受业父祖，其儒学修养不可小视。

以上种种，乃进士官员传播儒学之主要途径。以进士为主的汉族官员以传播儒家文化为己任，正是他们，大力将儒家文化推行到中国的北疆，并使之在广袤的北方传播开来。辽朝是儒家文化在我国北方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时期，上承隋唐，下启金元，儒学北渐对加速北方游牧民族儒化进程，开发北疆，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① 参见《契丹国志》卷18《刘六符传》；《石佛山造像题记》，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92页。

② 参见《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

③ 参见《辽史》卷79《室昉传》。

④ 参见《辽史》卷25《道宗纪五》。

⑤ 参见《梁援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21页。

⑥ 参见《辽史》卷96《姚景行传》。

⑦ 参见《王师儒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46页。

⑧ 参见《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第139页。

⑨ 《王敦裕墓志》，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79页。

⑩ 《金史》卷105《程荣传》。

CONTENTS

MONOGRAPH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uoba Xianbei (拓跋鲜卑) and the Hanizatio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Ma Xiaoli Cui Mingde (1)

Tuoba Xianbei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experienced a complex ha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relocation of Tuoba Liwei (拓跋力微) in 258 A. D to the substitution for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y Sui in 581 A. D. Although there was hanization in the periods from the first ancestor of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earlier stage of the Northern Wei, the mainstream was the perseverance with their national customs and culture. The overall hanization policy was promo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Wei, whereas some people of Xianbei rethought, exposed and criticized, and even attacked the overall hanization reform of Emperor Xiaowen, and Xianbei culture was once reemphasized. In that course, the attacks on the hanization policy in the Eastern Wei and the Northern Qi were fiercest and the non-Han customs became more popular. Though the non-Han customs relapsed in the Western Wei and the Northern Zhou, the adjustment on the han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relations was the main trend, and the potency and scope were lower, which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Northern Qi, the unific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prosperity of Sui and Tang.

Key Words: Tuoba Xianbei the Northern Dynasties hanization course

On Jinshi (进士) 's Entering Politics in Liao Dynasty Jiang Jinling (18)

This paper examines Jinshi's getting official pos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ccupation mobility, the final Official 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entering politics for Jinshi, and believes that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Han officials and even the whole Han people were enhanced with amounts of Jinshi joining the Qidan ruling class and even some becoming the prime ministers. It thinks the Jinshi-dominated Han official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border governance, spreading Confucius cul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fucian tendency of the nomads in the north.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Jinshi get official position Han Confucius culture

A Study on the Judicial Reform and its Special Policy in the Border Areas in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Li Guanghe (28)

During the period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uthority tried to push on the frontiers judicial reform,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the judicial resources which due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the reform had little progress. However, for adapt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borders and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the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proceeded the judicial basis,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personnel professionalism formation. Nevertheless, the special policies still could not me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of the border areas.